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李惠国

李惠国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LIHUIGUO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李惠国

李惠国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LIHUIGUO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RBE12/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惠国文集/李惠国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5326-1813-7

I. 李... II. 李... III. ①技术哲学—文集②科学社会学—文集 IV. ①N02-53②G3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9199 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朱伟明
装帧设计 姜明 明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李惠国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9.375 插页 8 字数 468 7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813-7/B · 57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 021—6266210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重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迸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张同





小
传

李惠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

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2年至1966年攻读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数学和物理。自1966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0年至1982年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统计学和科学论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至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副主任、代主任。现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曾参与国家有关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咨询研究项目。90年代以来主要出版物有《高科技时代的社会发展》(主编)、《社会科学新方法大系》(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大众百科—科学与社会卷》(主编)、《面向21世纪的国外社会科学》(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主编)等。

自序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只要是有益于公众的需要，就奉献我的学识、经验、智慧和辛劳，个人的荣辱无所萦怀。这就是我为人、处世、治学所遵循的原则。

治学的道路，正如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四十几年的思想砥砺，经历人生坎坷，昔日热血青年，而今华发苍颜。但是，我并没有后悔当年在懵懵懂懂中选择的这条道路。

（一）

在高中学习期间，我对理科和文科都有浓厚的兴趣。高三时，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接触到了《辩证唯物论》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它们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当时想，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恰好可以满足我对理科和文科的广泛兴趣。在我当时这种幼稚的想法下，我选择了报考大学哲学专业的志愿。

1957年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大学五年的学习期间，虽然当时没有细分专业方向，但我的兴趣侧重于自然科学哲学方向。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讲授物理学课的林万和教授，给予了我热情的指导，我们的师生友谊一直保持到先生逝世。

1962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招

收的自然辩证法专业四年制研究生,导师为于光远和龚育之教授。根据自己的志愿和导师的安排,我开始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数学和物理,并确定了物理学哲学的研究方向。于光远老师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热情奔放的性格、广博的学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不知疲倦的工作态度,以及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一直深深地影响我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这种追求真理的好奇与探索精神是我难以忘怀的。龚育之老师的严谨作风、思维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对问题的提炼和概括能力,使我受益匪浅。时任北京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组长的孙小礼老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导师不仅在业务上精心指导,而且在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热情帮助,指导我们参加学术活动、参观内部科学成果展览,带领我们去工厂和农村考察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等等。言传身教,深厚的师生之谊一直保持至今。

(二)

1966年,在我研究生学习即将毕业的前夕,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10年不仅给国家带来了一场灾难,也使个人遭到了不幸。屠格涅夫说过,“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掉时间相比。”我们整整10年失去了开展业务工作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期间,业务学习和研究工作只能在“地下”偷偷进行。在我被隔离审查期间,我偷偷把一本德语词典和《唐诗三百首》放在鞋里,带进了隔离室。一个人被锁在窗户钉死的屋子里,冬天也不给暖气,就是这两本书陪伴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972年从干校回京后,我一边参加政治学习,一边偷偷地开始了物理学发展史的研究,并翻译了海森堡的《20世纪物理学中概念的发展》等文章。待到“文革”后,才发表在《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等刊物上。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开始了各项工作的

整顿。我的审查也结束了。时值中央 13 号关于抓好钢铁生产的文件下发，国务院要从我单位抽调人员参加鞍钢工作组。单位负责人通知我，经领导班子决定，让我参加国务院鞍钢工作组的工作。并说，我们审查你时，看到你 1967 年写的报告，其中提到要在 8 小时外搞革命，革命不能冲击生产；生产指挥系统不能被冲击；生产规章制度要遵守……。我们感到你的这些看法与当前的文件精神是相符合的。这次让你去参加国务院的工作组，去鞍钢工作，你既要积极工作，又要谦虚谨慎。这样，我于 1975 年 7—9 月，参加了国务院鞍钢工作组。白天召开座谈会，下厂矿调查，晚上参加汇报会，深夜还要编写简报，向中央报告鞍钢的情况。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对以后的科研工作颇有帮助。

1975 年 10 月，于光远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希望认真研究，从理论上说明“科学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鼓舞了我，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全部从马恩著作中，找到每一论点的理论依据，引用马恩的话来说明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寻找资料，分析、论证，从理论上系统论述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在 1976 年的唐山地震期间，孩子在北京，我既担心孩子的安全，又惦念自己的研究工作，十分疲惫。幸好我大哥到北京出差，将女儿带回老家。就这样我坚持完成了《自然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原理》这一文章的初稿。粉碎“四人帮”后，经修改，1977 年以《自然科学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原理不容否定》为题，在《光明日报》（1977 年 6 月 15 日）上发表了。由于是最早论述科学与生产力关系的文章，因而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

（三）

粉碎“四人帮”，压抑了已久的科研热情迸发出来，我们积极投

人到拨乱反正的理论工作中,写了一些批判“四人帮”谬论的文章。“文革”期间,“四人帮”一伙,否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性。把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散布“理论无用论”,取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科学最基础的理论”。这些荒谬透顶的东西,竟然就是“文革”中的现实。针对“文革”中的这些谬论,我和柳树滋、傅隽和合写了《“理论无用论”的反动性》一文,发表在1977年1月18日《人民日报》1—2版上。这篇文章在科技界影响较大。

1977年5月7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之前,组成了院理论组,准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发表一批理论文章,以提高我院在社会上的影响。在院领导的指导下,我和栾文华、王昌宏等完成了《全面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这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1977年7月8日)1—2版上,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许多报刊转载了此文。这是当时以我院名义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前,院领导组织了老专家讨论,文章也集中了很多老专家的见解。文章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

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召开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的一部分。我筹备并参加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与陈昌曙起草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纲要》提到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已作为专项列入在《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中。之后,我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筹备活动,并于3月份参与了全国科学大会简报的编写工作。

从1978年起,我们一批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光远、钱学森、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开始了科学学这一新学科的研究。我完成了《现代科学整体化与科学学》的论文。同时,我们在北

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等地，进行了演讲，宣传这一新学科。1980年《哲学研究》第一期刊载了我的《现代科学整体化》一文。这篇文章对边缘科学、综合学科和横断学科作了区分和界定，并阐述了它们的作用，强调了科学与技术的更紧密的结合，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必要性。文章还提出了与科学整体化相联系的是现代技术的综合化趋势。各种新技术大都具有组合技术的性质。文章还指出应软、硬技术协调发展，加强软技术研究的重要性。文章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和设想。特别强调大学生的专业划分不要过早、过窄，要强调适当的通才教育。大学教育要侧重传授比较稳定、适用性广泛的基础概念和思考方法，而不是多变的、具体专业知识。

(四)

1979年底，我获得了德国 DAAD 奖学金，于 1980 年至 1982 年在慕尼黑大学统计学和科学论研究所作访问学者，进修了两年半时间。在所长、世界著名哲学家 W. 施泰格缪勒教授指导下，从事现代科学论的学术研究。该研究所是德国的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研究中心。W. 施泰格缪勒教授提出了系统的分析的科学论，成为科学哲学“新结构主义”创始人。他把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的静态研究与历史分析的动态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对科学及其进步的动力学研究的新方向。这里的学者大都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专业素养，他们的研究热情十分感人。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常常要从下午开到夜里两三点钟。W. 施泰格缪勒教授谦虚、热情和平易近人，工作认真，为人正直、朴实，他概念明晰、思维严谨，对我教益良多。在这段期间得到的严格的、分析的、科学哲学的训练和获得的知识，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工作。C. U. 穆利内在评价施泰格缪

勒的《科学论和分析哲学的问题与成果》多卷本巨著时指出：“在现代分析哲学中没有一部著作可与它媲美。”

回国后，我介绍了联邦德国科学论的研究与教学，在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和一些高校做了演讲，发表了有关文章。由于工作需要，后来我未能系统地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进行研究。

在德国留学期间，我还研究了德国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这对我回国后从事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以及科技发展战略和对策研究，受益匪浅。对我在科学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较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这期间我也关注和收集了民主德国哲学研究的有关资料。80年代后期，为纪念民主德国成立50周年，我撰写了《现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哲学》，收入《现代世界哲学》一书（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

1986年6月至7月，应德中友协和瑞中友协的邀请，赴德国和瑞士讲学和访问，为期35天。在法兰克福大学、杜伊斯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奥格斯堡大学、特利尔大学、圣加伦大学（瑞士）和伯尔尼大学（瑞士），作了学术访问，并发表了演讲，题为《80年代的中国哲学》和《中国的科技发展与科技政策》。《80年代的中国哲学》这篇文章收入了德国的丛书《辩证法—13》（Dialektik-Beitraege zu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en [13]）（Phahl—Rugenstein Verlag, Koeln, 1996）。

（五）

1983年至1988年，在领导动员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我承担了哲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副所长的的工作。“领导就是服务”，我在邢贲思所长领导下，与所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所科

研组织管理和外事工作中。

1983年评为副研究员,1988年晋升为研究员。

从1983年起,我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和《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分支编写组成员和《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并承担了“科学论”分支学科常务副主编的工作。我和殷登祥还负责了《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编委会的日常工作。《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编写工作历时10年。各种条目大部分都是在80年代中期完成的,反映的是当时的研究水平。由于经费原因,全书1994年才得以出版。通过编写《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学术界对该学科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基本内容,作了深入探讨,对学科建设起了推动作用。

参加国家发展战略对策研究,是我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

1983年10月至1984年4月,我被聘为国务院“世界新产业革命及我国对策研究”项目专家组成员。参与了项目总体报告的编制。在此期间,我应邀在京内外做了多次报告,发表了一些文章。本文集收录了两篇。当时有一位颇有影响的理论家不同意新产业革命的提法,认为只能提新技术革命。因此,我在理论上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关系作了说明,特别指出当前我们迎接的是世界新产业革命,将新技术产业化是当务之急,我们要研究的是新产业革命的对策。当时还有一种流行的提法,即所谓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我认为这种提法也不妥。我们需要的是既要大力发展新产业,也要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现代化,旧貌换新颜。我还讲了知识和信息是信息时代战略资源的观点,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特点是:智力和知识将会成为最大的社会生产力。在文章中还指出了要充分认识到一国经济向全球经济变化的趋势。文章中强调,当今时代的挑战实质上是对各国人民掌握、运用、传播和创新能力挑战。

1984年8月至10月,我作为国务院上海发展规划调研组成员之一,由宋平和马洪同志带队,赴上海工作。听取了上海市的汇报,进行了广泛调研。最后,在马洪同志领导下,由吴敬琏、戴园晨和我完成了向国务院的汇报报告的起草工作。关于2000年上海的发展战略目标,调研组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不宜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两番为目标,而应将上海发展成为金融、外贸、对外海运和航空运输的中心。并且提出大力开发浦东的战略,建议中央应在5年内,给予上海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1984年11月至1985年3月,我参加了中央科技领导小组组织的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研究,我在理论组工作。

为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1985年第一季度,协助马洪院长筹备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的两院院长联席会议,会后,由我完成了两院院长联席会议纪要。联席会议决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两院院长联席会议,商谈合作事宜;两院要相互交流科研项目计划和信息资源共享,开展合作研究,两院合作培养跨学科人才等。

1985年10月至12月,国务院布置社科院研究总结“六五”计划实施的经验。刘国光同志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六五”经验研究写作组的工作,我负责“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问题”部分。由董辅仁、戴园晨和我完成总报告的统稿,并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在“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问题”这部分的报告中,从10个方面作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报告强调了提高国民素质不仅是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当今知识的生产率已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提出了要增加智力投资并合理安排其投资结构。报告中指出,国际经验表明,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高于中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高于高等教育。报告还提出要建立和健全民主监督的法律制度,要制订公务人员异地任职的

回避制度和定期轮换制度。报告也强调了要注意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严重问题。

1985年至1988年,我和王兴成指导了8名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科学学,其中3名是中国科学院委托培养的。

1987年至1990年,我被聘为中国科协的《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的专家组成员,在李国豪院士主持下,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提出了有关交通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完成了课题报告。

1983年至1990年,这一时期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等问题,发表了《当代科技革命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三大知识领域相互结合的意义》等一系列文章。如,在《三大知识领域相互结合的意义》一文中,探讨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多层次上相互作用的机制和途径:理论层次上的渗透与结合、经验层次上的渗透与结合、方法论层次上的渗透与结合、学科功能层次上的渗透与结合、在学科的目的和价值层次上的渗透与结合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上的渗透与结合。有的文章还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和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等问题。这时期的研究为我从事社会科学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六)

1988年3月,院领导决定由我担任文献情报中心(后改为文献信息中心)主任。1991年,因1989年那场风波受到严重警告处分,改任副主任,领导仍让我主持全面工作;1994年起,改为代主任,一直到2000年11月。200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在担任文献信息中心领导职务期间,我全身心投入到繁重

的图书、信息业务的日常组织工作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组建院图书馆。在院领导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通过文献信息中心的领导班子与全中心及全院文献信息系统的全体同仁的努力,较好地完成了组建院图书馆的工作。在此期间,也为我院文献信息网络化和数据库建设,做了大量组织工作。

这一期间,我仍然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方向上,从事研究工作。

我主持完成了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课题研究,并于1996年出版《高科技时代的社会发展》一书。

1989年至1992年,承担了国家标准局的课题《学科分类及代码国家标准》的研究工作。我主持了社会科学学科分类及代码标准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于1993年由国家标准局颁布为相关国家标准,并由国家标准出版社出版。

1988年起,我主持《社会科学新方法大系》一书的编写工作,199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1993年至1994年,江泽民同志指示,“要在干部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国内有关专家编写干部教材《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由宋健同志主编。我应邀参加编写工作。我参加了第一、六两章框架和内容的设计,并撰写了第一章第三节“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特点”和第六章第二节的“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这两个部分。1994年,由科学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我还参加了讲课工作。

为迎接21世纪,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与吴元梁、张国春合作完成了《2020年中国的社会科学》。收录在李成勋主编的《2020年的中国》一书,作为第十四章,已由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96年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主持编撰《现代科学技术大众